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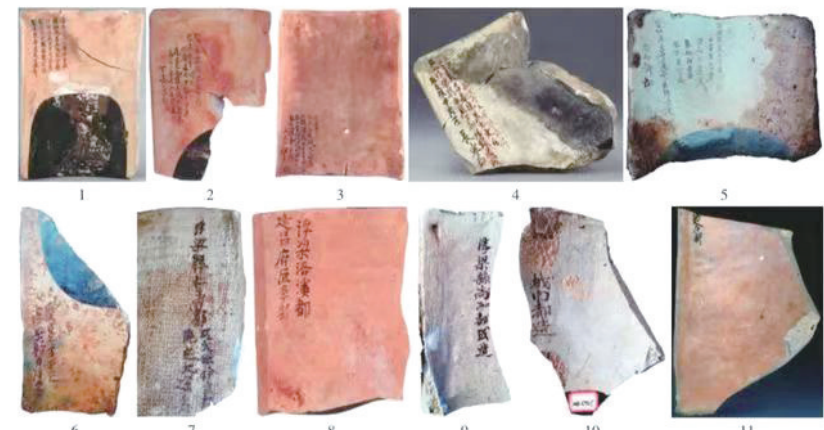
陶阳里：中华陶瓷文化的“基因库”

□ 龚齐珍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景德镇市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考察调研，他先后走进南麓遗址、陶瓷博物馆、明清窑作群，同非遗传承人亲切交流，了解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和对外交流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对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提出“要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字一句，既为千年瓷都擘画了发展蓝图，也为我国陶瓷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指明了方向。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景德镇市中心，涵盖108条千年老城里的、400余年的明清窑作群和70余年的陶瓷工业遗产，自古以来就是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中心，保留了景德镇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宋朝时，这里生产的瓷器“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被宋真宗以年号“景德”赐名，延续至今。当年镇民依河置窑、依窑而作、依作而居，绘就了“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

明清窑作群保留了景德镇特有的八座明清传统坯房，建筑面积3877平方米，它与徐家窑窑窑连成一个完整的窑作体系，是景德镇老城区保存较好的地面工业遗存和地标性历史遗迹。徐家窑始建于明末清初，长度为四丈九尺，建筑面积1037平方米，1949年改为建国瓷厂，它主要烧制碗、盘、壶等日用瓷、工业用瓷和釉里红、青花、青花釉里红、单色釉等艺术瓷，并于1979年停烧。徐家窑是目前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遗址。自2012年开始，景德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部分板瓦

镇将明清窑作群按照原样修缮复原。目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明清窑作群制作陶瓷，传承制瓷手艺，延续历史文脉。

明清御窑厂遗址，其平面呈长梯形，总面积约54300余平方米。御窑是明清两代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皇家瓷窑，从明洪武二年（1369年）创建，到1911年终止，延续了542年。这期间，御窑的规模不断扩大，建有衙署、作坊、窑房以及附属的祠、庙、亭、阁等，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窑厂。历代皇帝对御窑厂共派有40位督办瓷业烧造的督陶官，监造各类瓷器，缸、盆、盘、碟、碗、罐、瓶、坛、盂、钟等，无所不有。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同时在严格的监控制度下，造出了许多制作精工、造型典雅、装饰多样、纹样精美的瓷器，成为真正的无价之宝，御窑厂不仅代表了明清瓷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在中外瓷器发展史上也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御窑厂遗址地下遗存极为丰富，迄今为止，御窑厂遗址已经先后经历过3次主动性发掘和20

余次抢救性发掘，出土明清时期瓷器残片多达数十吨，近1000万片，其中出土了大量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各类器皿，器物种类、造型、纹饰均十分丰富，已修补成型御窑古瓷3000余件（套），成为印证御窑制瓷历史的“活化石”。该遗址还出土了其他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之御窑遗物，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明代御窑瓷器制作景象的认识，对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毗邻明清御窑厂遗址，其建筑主体由8个多曲面拱体结构构成，2021年5月18日，御窑博物馆试开放。博物馆常设展以明清御窑厂遗址600年的历史为支撑，展示的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30多年来在御窑厂历代官窑遗址所取得的重要陶瓷考古成果以及发掘的各个时期的重要遗物。该馆内的藏品大多为孤品、绝品，其中有元青花五爪龙纹围棋罐、明洪武釉里红地白莲纹大碗、明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明宣德青花五爪龙纹蟋蟀罐、明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纹盘、明成化素三彩鸭尊。漫步在传

统窑炉型的博物馆内，可以从中了解从元代浮梁瓷局到明清两代官窑的整个历史发展脉络，感受中华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明清御窑厂遗址是中华陶瓷文化的重要基因库，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早在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元朝在景德镇珠山设置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督造御用瓷器，其中的枢府釉（卵白釉）、元青花和釉里红瓷器最具代表性。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延续元朝官窑制度，在珠山设立皇家窑厂——御器厂，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停烧。在两百多年间，御器厂烧制了无数精美御器，如永乐青花、甜白釉，宣德青花、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的五彩，都是一代珍品。清朝时期，延续明官窑制度，并把明朝的“御器厂”改称“御窑厂”，御窑厂至清朝覆亡而停烧。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素三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五光十色的各种颜色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御窑厂周边先后建立建国瓷厂、人民瓷厂、艺术瓷厂、光明瓷厂等，生产了大量的日用内销和出口陶瓷、人民大会堂和南海专用陶瓷、国礼瓷等。20世纪末，随着对文化遗产的逐步重视，景德镇市政府腾退出御窑厂故地，用作考古和保护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市考察调研时指出，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严格遵循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的要求，实现了陶瓷文化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景德镇人在推进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用心传承千年技艺，窑火不熄，同时，又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千年窑址的有效保护、千年技艺的永续传承，使“千年瓷都”这张靓丽的名片越擦越亮。

仁人志士身上的君子人格

□ 李维武

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把君子文化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是我们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从古代君子文化中发现那些在今天仍有意义、仍有价值、仍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内容，使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还需要对君子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延续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君子”，把这些并不遥远的“君子”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楷模和直接榜样。

鸦片战争后的近现代中国，短短100多年间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上下求索、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在那个火药时代中，君子文化也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内涵、新的意义、新的特点。“君子”的称谓，在今天也没有消失，仍然在百姓生活中经常使用；但君子人格的内涵，却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下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保留着古老的道德内容，而且吸纳了新的道德观念。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以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为价值取向，是近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精神境界和道德实践的升华，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有一批被人们称为“君子”的

仁人志士。这种新的君子人格，正是通过他们的生命跃动和风骨气节，典型而生动地体现出来。这就使君子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意义和特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人们公认为“君子”者，首先当推“戊戌六君子”，即在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牺牲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积极参与与维新变法运动并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机，探索中国的出路，正如谭嗣同在《仁学》中所呼唤的：“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因此，在他们身上，既延续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舍生取义的君子人格，又体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种新的君子之德，标示了一种新的君子人格。

进入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大批决心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党的号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发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涌现了“救国会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投身时代大潮，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国民党当局惧怕救国会影响的扩大，将他们逮捕入狱。而广大爱国民众却对他

们高度赞扬，称誉为新的“君子”。

“救国会七君子”的称谓与“戊戌六君子”的称谓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人对那些献身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的赞誉。“戊戌六君子”牺牲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而“救国会七君子”的爱国之举，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集合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正是这样，“救国会七君子”先后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沙千里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邹韬奋后来进入解放区，在临终前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被党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李公朴则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战斗。他当时主编《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三个共产党员担任编委，使这个刊物实际上成为党所掌握的进步刊物。艾思奇的名著《大众哲学》，最初就是以《哲学讲话》为题目发表于这个刊物上，然后结集成书，流传至今。1946年7月，李公朴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为“救国会七君

子”中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采。”这里所说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是古已有之的君子人格；而“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则是近代中国的君子人格。古与今的君子人格，在李公朴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史良同样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部长，以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国家领导人。

因此，从近现代中国发现“君子”，不仅是对中华美德和君子人格的一种自觉传承，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君子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趋势。君子人格在经过近现代中国与时俱进的古今转化之后，进一步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活力。正是这样，新时代君子文化的研究和发掘，不仅要面向古代中国，而且要面向近现代中国，面向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破解职业教育发展难题

□ 韩琳 林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明确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紧密相连，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指出，我国职业教育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6100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26%以上；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各类技能人才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范式。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就业创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认可度之间仍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职普融通尚不畅通。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两种基本教育类型，两者之间互不关联。而职普融通的教育体系强调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实现职普融通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等多方全力配合与执行，但目前职普融通机制运行尚不协调，发展动力显著不足。要更好实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实现职普融通，亟需加快实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贯通培养项目，进一步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的衔接，提升中高职“3+3”“4+2”、中职与本科“3+4”、高职与本科“3+2”“4+0”贯通培养能力，切实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水平，促进有就业意愿的学生顺利过渡到劳动力市场，构建起职教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为新时代强国建设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产教融合尚未健全。按照建设实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任务要求，现代职业教育必须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技术革命方向调整专业设置。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碳达峰、碳中和在推动和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但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吻合度并不高，职业教育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的联动也不足。同时，企业对产教融合的认识不足、利益驱动不强，对打造实训平台，开展实习实训工作缺乏积极性。基于此，一方面，职业教育应坚持应用技术型办学方向，进行专业设置的前瞻性调研与规划，适应社会需要统筹设置、动态调整专业，引导职业院校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及学生就业情况，主动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另一方面，积极提升企业主体积极性，建设一批由职业院校与产业头部企业双牵头的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打造产学研研创服一体化体系。探索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信息化平台，指导职业院校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双师型”教师数量短缺。2022年10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发布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基本标准，旨在加快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出台后，各级职业院校纷纷推进“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工作，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认定范畴上不够明晰，认定条件也有待细化，“双师型”教师数量仍显不足。要拓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的来源，需要从已从从事实践工作三年以上的优秀人才中对口选聘，而不再是从高校毕业生中直接招用，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不少职教教师缺少应用实践素质和能力的问题。同时放宽企业技术骨干进入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条件，吸引有实践能力和丰富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才加入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区别于普通高校的“科研”标准和要求，高职院校评价“双师型”教师的标准要坚持多元化、个性化，真正适应职业技术教育的特色与要求，真正体现出职业技术教育的鲜明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特色。

